

#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启示与圣经》， 第一节，历史介绍，詹森，《 上帝的启示》，启蒙运动和基督教的回应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启示和圣经的教学。这是第一节，历史介绍、詹森、上帝的启示、启蒙运动和基督教回应。

我们邀请您参加我们关于上帝和圣经教义的讲座。

请和我一起开始祷告。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张开圣口，说出您的圣言。在这些讲座中鼓励我们；我们祈求向您学习，为您的启示而欢欣鼓舞，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尤其是重申我们对您和您的圣言的承诺。我们祈求，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佑我们。阿门。

我以圣经和历史的双重视角介绍了这些关于上帝自我启示、自我认知的教义的讲座，这些讲座最终将以他通过书面文字自我认知而达到高潮。

历史介绍来自彼得·詹森，他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教会领袖和福音派神学家。他写了《基督教神学轮廓》一书，探讨上帝的启示。他说，我身边有一本书，据我所记得，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批判性著作。

这是约瑟夫·麦凯布对 18 世纪伟大的法国理性主义者伏尔泰作品的选编和翻译。伏尔泰对《圣经》和基督教的攻击非常精彩，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小就对两者都怀有传统的敬意，而伏尔泰的蔑视几乎让我无法忍受。

引言中的引言，引用伏尔泰的话，愿伟大的上帝听到我的声音，上帝肯定不会生于女孩，也不会死在绞架上，也不会被吃进一小块糊状物中，也不会用矛盾、愚蠢和恐怖来启发这本书。愿这位上帝，所有世界的创造者，怜悯褻渎他的基督教派。呼，引言结束了。

伏尔泰并不满足于严厉批评基督教教义的愚蠢。他同样严厉地抨击圣经，不仅抨击其道德性，还抨击其可信度。他说：“我对化学的了解不够，无法愉快地处理金牛犊，《出埃及记》说它是在一天内制造出来的，摩西却把它烧成了灰烬。它们是两个奇迹还是人类艺术的两种可能性？”

遭遇启蒙运动。詹森说，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我正在被引导进入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运动之一——启蒙运动的智慧之中。

在伏尔泰这样的文学大师的笔下，我感受到了批判的力量，这种批判以敌意的方式质疑信仰长达 200 多年。尽管在伏尔泰时代，基督教教义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基督徒们基本一致地认为，圣经是来自唯一真神的特殊启示，被称为上帝的话语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还一致认为，上帝通过创造的世界存在普遍的启示，尽管人们对其真实程度的看法不一。

事实上，《圣经》是一部宗教著作，有罪的人类也能理解。但无论如何，基督教被认为具有独特的权威性和拯救能力，可以让罪人与上帝建立关系。伏尔泰并不是无神论者。

当他提出上帝存在的证据时，他的推理不是基于启示，而是基于某种自然神学。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严格的哲学语言。引用伏尔泰的话，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严格的哲学语言。

我们甚至没有义务去瞥一眼那些使用启示语言的人。结束引言。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如下。

基督教是否拥有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将宗教置于人类理性中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仅凭人类理性，我们能了解上帝什么？根据批判性历史，我们能相信圣经和教会历史中的奇迹是真实的吗？当圣经包含如此多不合情理的故事和不道德的教义时，我们能相信圣经是受上帝启发的说法吗？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批判性论点极大地削弱了基督教教义的可信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仍然将任何权威教科书称为圣经，但这种用法仅仅反映了其过去势不可挡的流行程度的残余。当谈到真正的圣经时，伏尔泰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上风。

彼得·詹森写道，后来当我转向神学研究时，我遇到了一系列对使用自然神学本身的强烈反对意见。大卫·休谟（1711年至1776年）抨击了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他拒绝承认上帝来自世界的论据具有任何说服力。

远非得出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天地创造者的结论，更合理的结论是多神论是真实的，或者上帝的力量受到软弱的限制。他认为，世界可以被理解为，这里我们引用怀疑论者，苏格兰怀疑论者大卫休谟的话，“与更高的标准相比，世界被理解为非常有缺陷和不完美，只是某个婴儿神灵的第一个粗鲁的尝试，后来他因自己的蹩脚表现而感到羞愧，放弃了它。它只是某个依赖性低下的神灵的作品，是他的上级嘲笑的对象。它是某个超自然神灵、超级年度神灵年老和昏聩的产物，自从他死后，它就从他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冲动和主动力量中继续冒险。”

哇。休谟对启示的主张甚至比伏尔泰更不满意。

他重点攻击奇迹，因为奇迹是启示宗教内容和理由的组成部分。奇迹在《圣经》中如此普遍，基督徒也如此频繁地以奇迹作为证实宗教的手段，因此选择奇迹进行哲学探索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从休谟的角度来看，奇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可能的，因为它们破坏了自然的一致法则。

因此，他认为，人类证言永远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让历史学家相信奇迹。他在关于奇迹的论述中总结道，建议基督徒坚持他们的宗教是建立在信仰而非理性之上的观念，并呼吁理性让宗教经受难以承受的考验。他以尖锐的讽刺结束了这些话，再次引用休谟的话：基督教不仅最初伴随着奇迹，而且直到今天，没有奇迹，任何理性的人都无法相信它。

仅有理性不足以让我们相信它的真实性，任何被信仰所感动而同意它的人都会意识到奇迹会继续发生在他身上，这种奇迹颠覆了他所理解的所有原则，并让他下定决心去相信那些与习俗和经验最相悖的东西，结束语。哇，我引起你的注意了吗？启蒙运动的胜利，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开始对启示录的讨论的原因，彼得·詹森写道，是因为我的经历是启蒙运动主要后果之一的缩影，并证明

了尽管之后有许多其他文化运动，但它仍然具有持续的意义。当伏尔泰的著作落入我手中时，后来当我接触到休谟的思想时，它们都极具挑战性。

伏尔泰使基督教信仰显得如此荒谬和狭隘，以至于几乎不值得继续效忠它。伏尔泰和休谟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这并非偶然。一种新的反超自然主义情绪正在进入历史研究，再加上对圣经的起源和性质的批判性研究，旧的正统观念在其根基上受到了挑战。

启蒙运动的论据因以下永恒而更具吸引力的信息而更加尖锐：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理性是判断的准则，人类自由是首要美德，人类进步是反对迷信和毫无根据的权威。现代性以这些断言的真实性为前提，当代西方人很少能完全摆脱这些令人着迷的束缚。

启蒙思想家们在人类自主权问题上与教会和国家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由于教会和国家都援引《圣经》来证明自己的权威，因此《圣经》成为争论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整个运动（伏尔泰和休谟只是其中两位代表）取得了对基督教信仰的惊人胜利。

基督教失去了其知识、社会和精神权威，尤其是在新教欧洲。在伯纳德·拉姆看来，启蒙运动对新教正统派造成的致命伤害是惊人的，而且从未完全恢复。另一位福音派思想家科林·冈顿观察到，“现代文化的突出方面是建立在否定基督教福音的基础上的。”

伏尔泰和休谟的著作是 18 世纪激进思想的两大根源，这些思想在 20 世纪末才传到我耳中。当然，它们是更广阔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洛克、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等伟大而多元的思想家。即使在 17 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也开始采取立场，根据《圣经》彻底改变教会和文化中的地位。

此外，19 世纪还发生了一场冲突；有人称之为启示与科学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宗教和启示的权威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主义似乎对圣经的创世故事和任何关于创造秩序的概念，即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在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立即引发了人们对任何声称绝对或独特的系统的质疑。

最终，诸如圣经启示、普遍启示和自然神学等思想都遭到了敌视，不仅来自哲学，也来自历史、人类学、宗教和科学的学科研究。我们只需想想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样的名字，就能认识到文化对启示的失望程度。基督教对启蒙运动危机的回应，我敢打赌你一直在等待这一点：对其声称拥有上帝独特启示的攻击在最敏感的时刻挑战了基督教信仰。

西方知识分子通常的反应是同意导致不信的批评，至少西方知识分子是这样。基督教知识地位的丧失是现代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的确，在过去 200 年里，教会经历了一次最伟大的传教扩张。

圣经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历史现象。对圣经的持续深入研究也同样如此。圣经不仅没有被彻底否定，而且是世界上印刷次数最多的书籍。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世俗主义对基督教的思想主张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毫不奇怪地导致了信徒的流失以及基督教社区内部的严重紧张和压力。教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那些采取不同策略应对现代性挑战的人之间的分歧则变得不那么重要。

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圣经》的神学评价。有些人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认为《圣经》是上帝所启发的，因此是上帝直接的自我启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伯纳德·拉姆斯谈到了新教正统教义所遭受的伤害，引述，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引述结束。

但他也指出，就像奇迹一样，它确实得以幸存，结束语。北美神学家卡尔·亨利是这一立场最著名的但并非唯一的倡导者，他关于《启示录》的六卷巨著一直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他是首批在波士顿学院这所备受尊敬的公立非信徒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随后在创立《今日基督教》和福音派神学协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总的来说，他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思想的福音派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学者，不会躲避知识分子的攻击等等，而且还可以以一种优雅的基督徒方式做到这一点，这也是卡尔·亨利的功劳。

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必须重复前辈的思想。圣经的教义和对圣经教义的理解都有了发展。他们表现出愿意吸收古代世界、其语言和习俗所提供的丰富信息，这可以被视为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之一。

此外，对启示的这种解释始终捍卫着普遍启示的概念。它通常遵循约翰·加尔文所定的路线，即自然界和心灵中存在着上帝的启示，但它被压制，使接受者既无知又有罪。然而，大多数对启示进行过认真思考的新教徒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当然，他们仍然对圣经怀有深深的敬意，尤其是新约中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没有这样的敬意，宗教体系很难在任何意义上保持基督教，除非是最名义上的。然而，已经有一个压倒性的决定，将启示录的主要内容从圣经中移走。

例如，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就提到“将启示与圣经的灵感等同起来是致命的”。灵感现在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减弱的方式，或被理解为接受者的启示。这些重新解释的根本目的是双重的：挽救上帝的启示和挽救圣经的见证。

如果《圣经》包含伏尔泰等作家所揭露的道德和历史缺陷，那么就不能太直接地将其认定为来自上帝的启示。它不应该被称为上帝所默示的圣言。然而，将这种重新解释视为仅仅是辩护则是错误的。

对于它的许多支持者来说，它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去掉他们认为传统理论中令人不快的元素，并用更符合所涉及的人类和神性特征的特征取而代之。因此，他们经常拒绝命题启示，认为它是理智主义的，并强调神人相遇的经历。他们往往倾向于动态启示，关注上帝的历史事迹，而不是一组静态的词语。

此外，他们认为旧理论未能充分体现圣经的多形式性。同样，他们也非常赞同启示绝不局限于宗教的观点。他们也比过去的前辈们更加赞同普遍启示和自然神学对基督徒的积极影响。

当然，所提出的启示神学类型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广义上讲，19 世纪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主导的，而 20 世纪则由新正统神学

之父卡尔·巴特主导。一些追随施莱尔马赫的人会发现启示的根源在于人类对上帝的体验，而施莱尔马赫肯定就是这么做的。

其他人，如巴特，会对这种所谓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作出反应，并称耶稣基督是圣经所见证的上帝之道。但也有值得注意的替代方法，例如沃尔夫哈德·潘能伯格等学者，他们谈到历史和末世论中的启示。罗马天主教神学家艾弗里·杜勒斯提出了当代神学中使用的不少于五种启示模型的分类法。

他将启示视为教义，其中包括卡尔·亨利和其他新教和天主教作家，启示是历史，启示是内在体验，启示是辩证存在，新正统，以及新意识。尽管存在多种定义，但他提出了一个定义，引用，可能被每个模型的许多追随者接受。这是罗马天主教学者艾弗里·杜勒斯。

他的建议如下。启示是上帝的自由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他将拯救的真理传达给受造的心灵，特别是通过耶稣基督，正如使徒教会所接受的，并由圣经和持续的信徒团体所证实的那样，结束引用。他的建议成功地反映了当今大多数启示处理中的一些重点。

毫不奇怪，鉴于杜勒斯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撰写的，其重点更多地放在教会上，而不是在相应的新教记述中。在新教系统神学中，尤其是受到 20 世纪新正统运动影响的新教系统神学中，似乎有三个重点始终保持不变，因为思想家们一直在努力证明和解释启示。杜勒斯的总结中可以找到其中一些，但不是全部。

每一个元素都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形成的：我们不再能将圣经本身视为启示本身，因此反映了对这种方法的一些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讲述彼得·詹森对新正统神学这三个特征的总结。启示作为事件，启示作为自我奉献，尤其是启示作为耶稣基督。

启示是一种事件。首先，许多现代神学家有意识地将启示等同于圣经文字的观点决裂，他们断言启示是上帝的行为、事件、情节。杜勒斯试图通过在启示的定义中使用自由行动一词来捕捉这一要素。

神学家们在接受这种启示观时，首先是在保护上帝的自由。丹尼尔·米格里奥雷谈到圣经中的情节，并补充道：“虽然上帝在这些事件中得到了真正的揭示，但神圣的自由或隐秘性从未消失。引用他的话，上帝在启示事件中并没有停止成为一个谜。”

19 世纪神学倾向于将上帝视为近在眼前、存在于其世界中，而后期神学家则强调上帝的超越性，以及上帝作为上帝的自由。在这方面，他们追随卡尔·巴特和新正统派。

启示必须被视为上帝自由主动赐予的礼物，因此既符合他的恩典，也符合人类的需要。启示掌握在上帝手中，而不是我们手中。我们无法控制它、要求它或组织它。

如果我们将一本书，甚至是圣经，视为启示，我们就是在宣称我们对上帝的权威，并采取法利赛人的做法，重视文字而不重视精神，大写的 S。通过将启示视为一个事件，我们思考圣经中的上帝的方式更符合圣经本身。圣经远非永恒真理的手册，而是上帝伟大事迹的杰出叙述，通过这些事迹，他拯救了他的子民并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据说将启示视为一个事件还有其他好处。

它也符合这一概念在《圣经》中经常出现的方式，无论是希腊语还是希伯来语形式。例如，该术语在《圣经》中不是作为一本书使用，而是在上帝与人类的相遇中，上帝通过这种相遇向人类表明自己。它经常具有末世论的成分，其中基督在时代末期的出现被称为启示。

它也用于描述上帝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事务世界。个人可能会得到启示，也可能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东西。此外，启示是一种事件的想法符合从比《圣经》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它的需要。

它提出了启示体验的主题，例如，许多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感受到的上帝存在的感觉，并使我们能够探索其他宗教中的启示报道。它还强调了上帝之灵的当前启发和鼓舞人心的工作，而早期的启示理论掩盖了这一点。因此，现代，尤其是新正统的启示观首先强调的是，启示是一个事件，而不是圣经的文字。

其次，它是自我奉献。在当代神学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关系性的这一事实也被大肆宣扬。在这一点上，道格拉斯的概念，即上帝将拯救真理传达给被创造的思想，将被视为无益的，因为它回归到所谓的命题或知识主义的启示观，其中信仰被视为接受他人权威的某些真理，而启示本身则被视为一组揭示的真理。

就现代新教神学而言，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真正核心的误解。本质上，基督教关心的是关系，尤其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相遇。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解释让人敬而远之。

我们需要的不是传播真理，而是传播人。事实上，启示的中心点是耶稣基督，这并非偶然。基督教的本质是我们与他的关系，而不是与关于他的一套话语的关系。

正如埃米尔·布伦纳所写和引用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这里，不再关心言语上的关系，而是关心个人关系。我们不再满足于相信它，但我们关心的是来到他面前，信任他，与他联合，并屈服于他。启示和信仰现在意味着个人的相遇、个人的交流、亲密的引述。

启示是一个事件；启示是上帝作为耶稣基督的自我奉献、自我奉献的启示。耶稣本人现已取代圣经成为基督教启示的内容。用罗伯特·摩根的话来说，从巴特的上帝之道的三重形式来看，只有道成肉身才能被称为神圣的启示。

他对上帝之道的三重定义是基督就是道；从衍生意义上讲，圣经和传讲道也被称为道。当启示被认为是圣经中一套绝对正确的真理时，人们往往会将其变成各种主题的教科书。特别是，圣经是道德信息的来源。

在十诫和八福等经文中，圣经为人们提供了过上美好生活的便捷指南。圣经还被认为包含优秀的科学和历史知识，这两个领域的进步都通过其教义得到检验。同样，人们从圣经中寻找有关未来的详细信息。

启蒙运动造成的破坏部分是这种对圣经滥用的遗留问题。对圣经本质的错误估计导致滥用其文字并忽视其真正意义。如果说现代主流新教神学家清楚一件

事，那就是没有出路；如果说现代新教神学家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没有办法重新将圣经确立为上帝启示的、绝对正确的话语。

我是否需要向我的听众和观察者说，我确实相信圣经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是上帝话语的启示，也是人类的话语，它引导我们理解圣经是上帝恩典的体现，但那是以后的事了。但我确实相信。然而，我确实发现，这段历史介绍值得我们思考，有助于我们在与邻居和其他人接触时考虑他们的心态，总的来说，它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当我们读到上帝和圣经教义的圣经介绍时，我们会更充分地探讨这一点。

然而，这一结论使启示的真正本质变得清晰起来。它实际上就是圣经的全部内容，即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启示。

有些人想争辩说，只有他才是上帝的启示，而其他所有关于他的启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意义都完全来自他。其他人，如杜勒斯的提议，更喜欢特别说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因此，基思·沃德也将耶稣的化身描述为上帝的核心启示行为。

有作为行为的上帝、自我奉献的上帝和耶稣的上帝。启示就是这三者。无论如何，很明显，在许多启示记载中，曾经由圣经、自然和教会传统作为启示来源承担的认识论重量，现在由耶稣基督承担。

他是信息，是上帝的话语，是约翰福音 1 章 1 至 3 节赋予他的头衔，所有其他话语都要以此为依据。这种关注有几个好处。首先，它的好处是与圣经本身的说辞和内容一致。

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和新约圣经的信息可以合理地概括为耶稣基督。此外，它使基督本人成为中介，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他就必须是中介，提摩太前书 2:5。他不是某个辅助信使，一个纯粹的先知，他本身既是上帝又是人类，是上帝的圣言，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并生活的地方。其次，它以最佳方式捍卫基督教启示。

它使真理遥不可及。如果它确实是真理，它就来自上帝，而上帝本身是无法被检验或考验的。它必须是自我验证的，而不是依赖于某种次等的帮助来验证。

例如，在捍卫圣经时，我们立刻就暴露出我们的恐惧，即圣经不是来自上帝。至于耶稣基督，他可以被宣扬，《独立宣言》本身将具有说服力，成为启示的事件，如果圣灵允许的话。将启示主要甚至完全定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使我们能够找到谈论其他启示主张者的正确方式。

我们对他的评价可以衡量一切。特别是，它使我们对圣经抱有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能公正地对待它的本质。达拉斯正确地指出，圣经的作用是证明耶稣基督的启示。

如今，人们通常认为圣经是上帝圣言的见证。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称圣经为上帝圣言，并尊重它在引导我们走向耶稣基督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我们不会将它与上帝等同，因为圣经必然具有上帝自己的特征。稍后，我将在诗篇 119 中展示主使用同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和上帝的圣言。

有趣。据判断，这样我们既避免了对圣经的崇拜和不适当的崇拜，也避免了圣经的过时历史和科学可能成为信仰不必要的绊脚石的危险。评估。

好吧，我们已经搅动了水流。我想，我们已经搅动了不少木材，首先是伏尔泰，然后是坦率地说是异端者的人：大卫休谟，我的天，最伟大的怀疑论者。

评估。我们首先必须说，上面部分概述的启示录记载是一项重大的智力和神学成就。有时，人们似乎认为基督教信仰本身作为一种智力构造会消失。

圣经遭受了如此多的批评，似乎已经无法再保持任何权威，基督教或三位一体的任何正统性似乎也已不复存在。通过主张圣经所证实的基督的中心地位，上述观点的支持者能够将三位一体的教义带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可以对此表示赞同。

当我们看到并接受基督教启示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启示的行为特别是上帝之灵的工作。这意味着当我们被启示所吸

引时，我们必然与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关。事实上，这是可以宣扬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版本。

它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而是关于上帝，以及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的好消息。它荣耀上帝，并试图应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即基督教只是人类学的放大版。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我们对上帝的想法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想法）投射到这个所谓的神身上。

然而，即使《启示录》已经如此恢复原状，它是否完全成功地公正对待了对上帝的认识？彼得·詹森说，我认为不是。他的福音派风格正在显现。在关键点上存在一种症状性的模糊性，使我们无法获得圣经引导我们期待的那种知识。

神学思想家成功地将上帝带回中心，成功地将上帝带回事物的中心，但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并没有反映出圣经中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本质。如果基督教信仰无法以我们在圣经作者的体验中看到的相同方式与上帝建立关系，那么其有效性必定值得怀疑。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例如，它是否将上帝置于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对信徒生活的权威地位，来检验现代对上帝的重建的真实性。

现代神学中所说的启示能做到这一点吗？除非它能满足这一重要标准，否则很难说它能提供与圣经中提到的上帝知识有明显连续性的上帝知识。然而，难道不是像所有现代思想一样，神学本身反映了人类相对于上帝的自主性概念吗？现代神学的信仰与新约的信仰相符吗？现代启示的记载包含许多真实内容，尤其是对耶稣基督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但该记载也存在根本缺陷，这导致了不同的结论。

第一批信徒并不认为圣经是上帝之言的见证，而是认为圣经就是上帝之言。因此，信仰本身必然会呈现出一种与他们不同的形式。他们使用见证这个词，但这是使徒的资格之一。

当我们谈论使徒时，我们使用一个不同的、更权威的类别。一些学者将施洗约翰作为模范见证人，这很有趣。他不是使徒。

在启示录重建的三个主要要素中，不愿意将圣经视为上帝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分水岭。这决定了所得出结论的性质。

让我举例说明。我们被告知，启示是上帝的行为，是一个事件。事实确实如此。

但没有必要通过先验地宣称发表言论并不构成具有持久影响的事件来限制所讨论的事件。我们发现，在所有记载中，上帝的伟大事迹都包括伟大的言论事迹，例如在西奈山。此外，人们经常指出，如果没有伴随的解释性语言，上帝的事迹是无法理解的。

更根本的是，没有必要通过决定事件的偶发性来限制事件，因为它的启示性可以在发生时产生影响。相反，即使某个启示是一个特定的事件，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启示可能不像太阳、月亮和星星那样具有偶发性，但它很可能通过描述它的文字继续存在。一旦揭示，谜团仍然是揭示的谜团。

事实上，基督教本质上是承诺性的。那么，我们在启示中看到的难以捉摸的偶发性言语行为是上帝有意为之的，尽管这是为了维护上帝的自由，但却损害了上帝言语的忠诚。再说一次，基督教本质上是承诺性的，如果这是真的，Gentian 认为这是真的。

然后，我们在启示中看到了上帝意图的难以捉摸的偶发性言语行为，尽管这是为了维护上帝作为上帝的自由，但却损害了他在言语上的忠诚。其次，我所描述的启示记载倾向于自我奉献的理念。没有人能否认，这一概念试图捕捉一个重要的真理，即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性质，而且有时，信仰遭受了过度形式化和知识化的困扰。

但这种语言的目的显然是使启示远离对受启发语言的依赖，使对人的信任优先于对言语的信任。然而，即使在人际关系中，值得信赖的语言也是信仰产生的必要途径。我们需要信任彼此的言语，我们对信任一个人和信任那个人的言语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没有言语的关系是贫乏的。与看不见的上帝的关系又何其贫乏？这难道不是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吗？在今生，我们凭着信念而不是凭着眼见或经验行事，而上帝所谓的自我奉献表明了一种尚未属于我们的直接关系。我认为这相当于一种希望，即我们可以用某种东西来代替圣经中的上帝之言，这种东西可以公正地处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但事实上，这种东西并不实质性。

我们是否也生活在从前几代人那里收集来的神学和宗教资本中，他们对圣经的语言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我们真的能通过如上所述分析启示录得出三位一体的教义吗？或者它实际上源自圣经的确切语言？第三，启示录的叙述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正如我已经观察到的，没有这种重点的神学几乎不可能是基督教的。然而，在试图保护启示录免受批评攻击时，基督和见证他的话语之间做出了根本区分。

正如基思·沃德所写，“圣经，至少在基督教信仰中，是由一组人类见证神启而组成，而不是构成启示本身的内容。”但我们所信任的基督必须是圣经中的耶稣，而不是其他人。我们通过言语接近他有一种特殊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起源和重要性上是不可或缺的。

把最终的启示负担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但通过除受启发的话语以外的其他方式接近他，这种选择再次让我们陷入黑暗之中，而我们本来可以期待光明。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启示是一个事件，情况就更是如此。仅仅见证这个事件就能满足信仰吗？非常恰当、非常符合圣经、非常恰当的言语和见证语言是否比福音和使徒的更基本的语言更优先？我选择只评论最近新教神学的三个主题。

对此和其他材料的调查得出了双重结论。首先，启蒙运动及其后果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问题有待解决。启示教义的每个要素都存在着不幸的、不实质性的分歧，这主要源于否认圣经的话语在任何直接和启示意义上都是上帝的话语这一观点。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后启蒙时代恢复这一地位的任务确实非常艰巨，但替代方案尚未成功。其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挑战那些最初提出挑战的人方面。马克思、弗洛伊德、伏尔泰、休谟，甚至康德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确实，教会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分歧，最明显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但负责的《启示录》著作已经从 20 世纪 60 年代更为激进的“上帝已死”解决方案中退缩。前一代人抛弃的一些主题，如命题式的《启示录》，终于开始受到认真关注，人们认识到启蒙文化的基本原则既非常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也非常不人道。

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结束彼得·詹森的历史介绍，并开始从圣经的角度介绍启示和圣经的教义。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启示和圣经的教学。这是第一节，历史介绍、詹森、上帝的启示、启蒙运动和基督教的回应。